

民国时期

新词语研究

李娜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新词语研究

李 娜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新词语研究/李娜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607-5013-2

I. ①民… II. ①李… III. ①汉语—外来语—研究—民国
IV. ①H136.2



责任策划: 董付兰
责任编辑: 董付兰
封面设计: 张 荔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10 印张 25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13017041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汉语词汇通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0AYY004))阶段成果

辽宁省社科规划项目：“民国白话教科书与汉语词汇系统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L13BYY013)阶段成果

目 录

绪 论 民国时期新词语的价值和意义	(1)
一 词汇史研究	(2)
二 民国词汇研究	(5)
三 语料来源和研究内容	(9)
第一章 民国单音节新造字研究	(11)
一 民国新造字字素分析	(16)
二 民国新造字同声符字系联	(54)
第二章 民国新外来词	(107)
一 外来词的来源	(108)
二 附 录	(120)
第三章 民国新方言	(156)
一 民国新方言的地域分布特点	(157)
二 新方言的词性	(164)
三 民国新方言的文体来源分析	(170)
四 附 录	(189)

第四章 民国新熟语·····	(223)
一 熟语的界定·····	(223)
二 民国新成语·····	(224)
三 民国新典故·····	(228)
四 民国新惯用语·····	(247)
五 附 录·····	(257)

绪 论 民国时期新词语的价值和意义

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与交流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思维工具,“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①。人类的历史、文化都是依赖着语言而存续、传播、发扬的。因而,我们常常说,语言是人类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历史、人类文化的“活化石”。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曾经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②。人类学家怀特也说:“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也就仅仅是动物而不会成其为人类。”^③可见,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都蕴含了本民族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传承着本民族绵延不断的历史进程。

“社会生活的任何变化,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地在语言——主要在词汇中有所反映,因为语言是社会生活所赖以进行交际活动的最重要的手段。”^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① [苏联]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35 页。

②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86 页。

③ [美]怀特:《文化科学》,曹锦青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1~32 页。

④ 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6 页。

面,诸如政治、军事、法律、习俗、工商业、教育等等的发展变化,无不影响着词语的产生、发展、演变。所谓“什么时代说什么话”,现代社会的“很Q”在十年前的报章文学作品及口语中都是无从寻觅踪迹的,而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众多词语,如“炮轰”、“大字报”、“走资派”等现在又仅仅出现在某些文学作品中而已,如今的年轻人是无法理解其背后的辛酸与泪水的。现在我们看“五四”时期的报章文字,有些需要借助于字词典的释义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读懂;而我们同样也相信,我们现代的报章文字如果乘坐时间列车到一百年前给民国时人看的话,他们也是八成看不懂的。一定时代的话语必定会牢牢地打上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烙印,时代因素已经深深地渗透在每一个时代新词语中了。因而,我们可以从对一类类相关的时代新语词的研究中,探寻语言发展的脉络和规律,透视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 词汇史研究

在汉语史诸部门中,词汇史的研究向来是比较薄弱的。吕叔湘曾经说过:“汉语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应该说是语汇的研究。个别词语的考释,古代和现代学者都做了不少,但是在全部汉语语汇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很微小的。”^①

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一方面是由于词汇研究本身难度就很大,“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力量跟这项工作的繁重程度很不相称”^②;另一方面,也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历史有关。早在20世纪40年代,王力先生就撰文指出:“无论怎样‘俗’的一个字,只

① 吕叔湘:《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载《中国语文》1961年第4期。

② 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8页。

要它在社会上占了势力,也值得我们追求它的历史。……我们对于每一个语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何时产生,何时死亡。虽然古今书籍有限,不能十分确定某一个语义必系产生在它首次出现的书的著作年代,但至少我们可以断定它的出世不晚于某时期;关于它的死亡,亦同此理。……我们必须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旧观念,然后新训诂学才真正成为语史学的一个部门。”^①这里王先生所说的“新训诂学”,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研究主题:汉语词汇史。

词汇史研究与训诂学既有区别又紧密相关。从性质上说,训诂学属语文学,词汇史属历史语言学。训诂学最主要的目的是,正确理解古代文献语言及内容;词汇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弄清汉语词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面貌和特征,了解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探索这些变化的原因,揭示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规律”^②。二者的研究对象虽然各有侧重,如训诂学比较注重疑难词语的考释,词汇史研究更重视词汇发展面貌的描述、词语的演变和规律研究及理论探讨等,但是“训诂所涉及的层面很广,其核心内容是词义;词义是词汇学的重要一环,训诂学与词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不只词义而已,语言材料的处理也可相通”^③。但是在进行词汇史研究时,总是难以冲破训诂学以高文典册的雅诂旧义为主、轻视俚俗常语及旁征博引以及考证溯源的藩篱。“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第四章‘词汇的发展’中勾勒了若干组常用词变迁更替的轮廓……此后陆续有学者对王先生论及的各个新词出现的时代上限提出修正,但讨论对象基本上没有超出他举例的范围,且仅以溯源(找出更早的书证)为满足。溯源当然是词汇史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是相当

① 王力:《新训诂学》,原载《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后收入《龙虫并雕斋文集》(1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1页。

② 转引自张青松:《试论训诂材料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价值》,载《惠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③ 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书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重要的一环,因为不明‘源’就无从探讨‘流’,而这也正是传统训诂学的研究方法;但是对于词汇史的研究来说,‘仅仅溯源是远远不够的’。”^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除了上述这些零星的补充修正以外,王力先生所倡导的“词汇史”构想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和积极的实施。

因此,尽管中国词汇学可谓源远流长,但传统语文学在乾嘉时期所达到的极盛难继的局面以及它的深远影响,又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汉语词汇学的进一步开拓。词汇史发展迟缓,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且,词汇反映纷纭复杂的现实世界,又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之中,某一个时期或某一方言中的词语,到了另一时期或另一方言中就会变得十分难懂,这就使人们也感觉到对词汇的系统难以把握。另外,“汉语词汇系统的存在和演变与特殊的汉文化社会紧密相连,并深深烙上了汉民族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烙印。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存在是一定时期相对比较稳定的社会的反映,是汉民族文化历史积淀的产物。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动态演变与社会的动态演变紧步跟随,社会发展促使新事物不断出现、旧事物逐渐消亡,反映在词汇系统上就是新词语不断产生、旧词语逐渐消亡。然而,系统的演变又不是无序的、任意的,它又要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制约。如哪些词语应进入词汇系统,哪些应被排除在外,其中都受制于汉民族特殊的文化背景、文化心理”^②。这也大大增加了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难度。

此外,对于词汇史研究者而言,材料是研究的基础。我国历史悠久,资料丰富,这是研究词汇史最有利的条件。但是汗牛充栋的第一手资料,其校勘、整理工作现在做得并不是很完善,也

① 张永言、汪维辉:《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

② 董印其:《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研究探讨》,载《语言与翻译》2008年第1期。

缺少比较全面的专书索引……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词汇史研究工作的难度。实际上,只有在对文本材料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才能用描写的方法进行统计、归纳和总结,才可以进一步开展我们发掘时代词汇发展面貌、寻找词汇发展规律的工作;只有在广泛收集、认真鉴别、准确识读文本材料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这些材料的利用和分析;只有在弄清词语演变过程的具体事实的情况下,才谈得上探讨词汇演变的原因和规律等理论问题。而目前这些基础工作的难度也是汉语词汇史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因此,吕叔湘先生说:“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力量跟这项工作的繁重程度很不相称。”^①

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一领域开拓出一片新天地来。吕叔湘先生在写给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术讨论会的信《我的一点希望》中提到:“汉语词汇发展史很重要,要好好研究,要总结词汇发展的规律,但现在还没有一本很好的研究词汇发展史的学术专著,希望有人去从事这项工作。”^②

二 民国词汇研究

民国始于清朝灭亡,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虽然只有短短的38年,但是那段波谲云诡的历史却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曾经历过的。而且这是一个重大的语言变革时期——自“五四”白话文运动开始,白话文战胜了习用几千年的文言文,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文白演变是20世纪初重大的语言变动,‘五四’时期文白的转型深刻广泛地影响了我们整个民族的

① 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8页。

② 吕叔湘:《我的一点希望》,《词汇学新研究》编辑组编:《词汇学新研究首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术讨论会学集》,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思维和演说方式,成为中国文化由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起点。”^①词汇作为对社会最直接、最敏锐的反映者,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巨变。所以,对民国时期词汇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次,随着西学东渐、国门敞开,尤其是两千年封建社会的终结,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无论在社会意识形态还是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经济等的发展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变动和发展。民国词汇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也呈现出勃勃生机。

社会的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在词语中被真实地记录和保存下来,对民国时期词汇面貌进行细致的考察、描写和分析,不仅对汉语词汇史、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也将为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材料。

然而,在语言学的历史上,尤其是汉语词汇学的研究中,民国时期的语言现象却一直处于被冷落的状态中。尽管民国时期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期,但对民国时期的语言发展状况,尤其是词汇发展演变的历史的研究,始终是比较薄弱的。在众多的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中,对民国时期词汇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除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词汇学研究中多涉及民国时期的词汇,再后来尤其是进入到词汇研究繁荣时期之后的词汇学研究,对民国时期词汇的关注非常少,几乎是将民国时期划到研究范围之外了。研究古代汉语词汇的,关注点到清代为止;研究现代汉语的,关注的多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词汇。即使有涉及民国时期词汇的研究,也多是把民国时期的词语作为语言材料罗列一二,没有进行系统全面的描述与分析。

就目前我所看到的专著,研究民国时期词语的有:北京师范

① 徐时仪:《试论古白话词汇研究的新发展》,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1959)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潘允中(1989)《汉语词汇史概要》、刁晏斌(2006)《现代汉语史》等。除了这几部专著中涉及民国词语的研究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语言研究中,还有一些夹杂在语法和西方理论引介研究中的、以民国词汇为材料的词汇研究。这些研究展开的背景是白话文正式成为书面语。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随着汉字改革运动、白话文运动、国语统一运动的开展,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因此,也直接对汉语词汇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一些研究者将研究的目光由古代转向现实的活的语言——白话文(国语),于是对民国时期国语词汇的研究也就悄然开始了。但是这时汉语词汇学还没有正式建立,因此大多数的民国词汇研究还是散布在国语文法论著和新式训诂学的研究中的;而且当注重研究形态发达的语言的西方语言理论自清末引进中国后,我国学者也大都忽略了汉语是形态不发达的语言的实际,将词汇的研究放在语法学的研究中。所以,尽管自民国开始,便有学者将白话文、国语作为语言研究的对象,但是大都夹杂在语言研究和对西方语言理论的引介中。如胡适(1922)《国语文法概论》中关于汉语复音词形成方法的研究^①;胡以鲁(1923)的《国语学草创》论述了国语的缘起、发展,关于词汇的内容占相当的分量;黎锦熙(1924)《新著国语文法》中对字和词的区别的简明扼要的说明,黎锦熙(1930)《国语中复合词的歧义和偏义》对词的意义讨论^②;王力(1943)《中国现代语法》对双音节单位与词的关系的探讨,王力(1946)《中国语法纲要》中对字和词、词和词组区别的分析,王力(1954)《中国语法理论》中对复音词的构词研究

① 参见胡适:《国语文法概论》,收入《胡适文存》第3卷,黄山书社1996年版。

② 黎锦熙:《国语中复合词的歧义和偏义》,载《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1期;收入杨庆惠编选《黎锦熙语言文字学论著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等;吕叔湘(1944)《中国语法要略》对字和词的关系的研究,对复音词类别的分析,并对简称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等;还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法革新讨论,也曾集中探讨了关于“词尾”、“复音词的类型和产生的原因”、“汉语词汇的发展”等问题。从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还有二十余篇谈到民众常用词汇的问题,主要有:研究基本词汇问题的;研究常用词汇、一般词汇问题的;研究译名的;研究同义词的;研究新词语的,等等。这段时期的研究尽管涉及的内容和方面都比较广,但是学者研究的目的大都不是专为解决词汇问题的,而是为了说明语法问题或者解读古书而用的,因此,对词汇问题的研究还是十分零散、不成系统的。^①

尽管对民国词语的研究很少,而且比较零散,但是有关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的词汇状况,有意大利人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他对1840年到1898年的汉语语言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外来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历史研究。而他的研究也以其创新性和系统性而为众多的汉语词汇研究者所关注。虽然我们不能说外国的语言学者不能够首先涉猎汉语研究的某一个领域,但是中国的语言研究领域由西方人来开创,这的确也让我们多少感到有一些汗颜。

由上可知,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中,民国词汇的研究十分薄弱;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中,民国词汇史的研究更是一个空白。这一方面大大加大了研究的难度,提升了研究的高度;另一方面,更是说明了我们这项研究的重要性之所在。因为历史的发展是延续的、是连续的,词汇的研究也要求展现出词汇发展的连续性,无论什么研究,都要求研究的连续性和不间断性。因此,我们不可能跨过民国,直接从清代进入到现代,我们的词汇发展

^① 参见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书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83~89页。

也绝对不能忽略掉民国时期的词汇发展历程。

三 语料来源和研究内容

语言是无边的海洋,在海边捡到的一片贝壳、一粒沙子也许就足以让我们了解大海的内涵和历史。如何寻找到最具历史 and 价值的贝壳,则是我们语言研究工作者要着力去做的第一件事情。尤其是在词汇研究中,这片贝壳更要厚重,有积淀。

现在,我们有一部很好的词典,可以作为我们全面研究民国词汇面貌的语料,那就是《汉语大词典》^①。“《汉语大词典》选用从先秦到现代‘反映口语’的文献三千多种,编写词目三十七万个”^②,而且语料取材的范围自经史子集、笔记、小说、戏曲、传奇,以至于民间谣谚、大众文艺都有广泛的搜集,可以说把古今雅俗的材料几乎都联系起来了。因此可以说,《汉语大词典》“是目前研究汉语词汇史的最方便、最有效的材料”^③。我们将利用《汉语大词典》充实的语料,研究民国词汇。

本书尝试着从两个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新词语进行研究:

一是对民国时期的单音节新词(包括新造字形的单音节词和产生新义的单音节词),运用字素分析法对其意义组成进行解析,继而以此为基点对形声字声符在造字、构词中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以声符为线索系联意义相关、相近或相对、相反的字(词)群,从而对汉语词汇系统中单音节词的系统性有更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二是对民国时期书面文学作品中的新外来词、新方言、新熟

①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

② 杨端志:《汉语史论集》,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272页。

③ 杨端志:《汉语史论集》,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272页。

语进行分析。新词语研究一般都离不开对新词语来源的探寻，因此我们抓住民国时期新外来词、新方言和新熟语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解读。

对语言学尤其是词汇学的研究，语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相应章节附录了丰富的语料，主要包括《汉语大词典》中收录的民国时期的新外来词、新方言和新熟语，还有对《汉语大词典》新外来词的补充材料。

第一章 民国单音节新造字研究

汉字承载着古老的华夏文化并流传至今。在世界历史上曾拥有重要地位的古老文字中,唯有汉字仍在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曾在古埃及历史上活跃了三千多年的圣书字早已作古;苏美尔的楔形文字最终也没有作为意音文字存在下去,而是变成拼音文字;中美玛雅人的图像文字随其国家的灭亡也消失殆尽;古拉丁文、古希腊文,也只有少数专家才懂得。唯有汉字是当今世界上仅有的仍在通行使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字。汉字以其生动而形象的造字心理机制传载着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从不同侧面再现了上古初民们的心态观念和悠远的记忆,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证实了华夏民族超凡的智慧。

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之一的汉语,不仅有着悠久而绵长的历史、丰富而繁杂的内容,从古至今的变化也十分明显:不必说普通人读先秦诸子的散文感觉十分拗口、搞不明白,即使是专业的语言文字工作者,拿来一篇清代的古文,也需要借助一定的工具书才可顺畅阅读。即使是百年之前的民国,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报章杂志拿出来阅读,也会感到有些困难;而民国时人如果能够来到现代社会,也会如同到了异国他乡一样,尽管很多语言词汇听起来似曾耳熟,但是个中意思却是难以准确把握的。再近一点,在我们的身边,许多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弄潮儿们